“大翻译”视阈下的翻译现代性思考
——以“企鹅经典”《庄子》译旅为例

付添爵
(南昌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　要:“大翻译”体现的是记忆与翻译的深层话语耦合,它能够从阐释性话语联结的维度对翻译现代性作出洞悉与解读。“大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明确了记忆话语的生成包含翻译阐释的因子,而翻译话语是不同记忆在语际、语内与符际间的重释、再塑与转换。基于此,深度分析“企鹅经典”《庄子》译旅中的文本结构重置可发现,“大翻译”视阈下的翻译现代性实际上是主体依据自身的记忆话语,通过翻译行为不断对他者进行的记忆再造与形象重塑。

关键词:大翻译;记忆话语;翻译现代性;《庄子》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1-0122-10

0　引言

“记忆”随“记忆主体”而生,迟至现代才获得关注。20 世纪以降,记忆研究横跨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神经脑科学等领域,具有泛化特征和显性跨学科能力。记忆研究的话语形态与翻译话语的跨文化、跨学科连接,二者互为学理,互构路径,形成“大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为反思翻译现代性提供了新视角。由此,大翻译、记忆话语与现代性追求,三者形成了某种思想性对话。本文旨在探讨记忆与翻译的话语联结赋予“大翻译”形构及阐释现代性的重要功能与内涵,并以“企鹅经典”《庄子》译本之旅为例进行分析解读,洞悉文本译旅背后的翻译现代性。

1　大翻译:记忆与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

1.1 “多重归属”的记忆话语形态

记忆是记忆主体的自我命名(利科,2019)。因此,对“记忆”的觅见离不开对记忆主体的探讨。在希腊神话中,女神摩涅莫绪涅(Mnemosyne)掌管记忆与语言、文字。无论是诗

收稿日期:2024-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翻译、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23AYY021)、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晚清民国译家翻译教育思想之记忆深描与书写”(YY212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付添爵,男,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跨文化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付添爵. “大翻译”视阈下的翻译现代性思考——以“企鹅经典”《庄子》译旅为例[J]. 外国语文,2025(1):122-131.

人西莫尼德斯(Simonides)的“记忆术”(ars memoriae),还是苏格拉底秉持的哲学家应具备的“良好的记性”(柏拉图,2007:204),抑或柏拉图“理念”之本源的个人记忆,以及亚里士多德视为“属于过去”的个人记忆等,记忆都被视为个体生命的必然属性,即个体天然拥有独立的记忆机制与功能。然而,直到尼采提出“纽带记忆”(bonding memory)后,对记忆的认识才产生质变,即记忆不单属于个体的非理性的纯然存在,也属于集体行为的理性化的历史生成。集体也由此成为“记忆”的承载主体。

受涂尔干社会本体论影响,莫里斯·哈布瓦赫(Halbwachs, 1980:48)将记忆研究从个体层面提升到集体维度,主张“完成记忆行为的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而任何的个体记忆都是观察集体记忆的一个侧面”。不过,他的集体记忆属于一种共时性的无差别的均质状态,对于横亘长时段的集体记忆所附加的文化因素缺乏考虑,也忽略了记忆与历史的重要连接。于是,诺拉(Nora, 2015:XVI)使用“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将集体记忆“改为由超越时空的象征媒介来自我界定的抽象的共同体”,拉近记忆、历史与文化的距离。扬·阿斯曼(2015)进一步从文化维度对集体记忆形成的谱系进行历时的有差别的非均质性考察,着重探讨超越共时集体层面的历时性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建构。于是,文化记忆成为以社会和文化为基础,超越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纽带记忆、交往记忆的线性存在。本文所指“记忆”指集体框架下附着文化色彩的长时段的“文化记忆”。

然而,寄身于他物的记忆并非简单因循“个体—集体—文化”的线性存在,上述学术史渐进更多是一种研究驱动下的叙事方式与主观排序,而非记忆本身的客观形态与深层本质。这便是利科(2019:10)谈论记忆“多重归属”的旨趣所在,记忆与反身代词的联用使得记忆在语言层面经常叙述表征为“记忆是我们的,而且首先是我的。我的记忆属于我……我们的记忆是互相交织的,我们的叙述也是如此,这使我们轮流成为各个叙事的主角、个人或与大众融合的参与者”。换言之,作为记忆主体的自我命名,记忆在深层意义上是主体的话语表征,即“多重归属”的话语表达才是记忆的本质形态。另外,利科的这种“多重归属”与霍夫曼(Hoffman,2004:144-204)笔下记忆主体所呈现的“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具有同构性,因为记忆经历了主体间多重话语辗转与传递。相较于 memory,汉字字源更明示了“记忆”是由储存话语信息的“记”和提取话语信息的“忆”构成,而“记”与“忆”在“主体”译解与间性阐释下产生的错位与张力往往促发“记忆话语”的形成。

利科(Ricoeur,2002)认为,记忆是在具体语境中不同记忆发生争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要言之,记忆的“内容或意义”是记忆主体在“多重归属”与“代际传递”间施加于最终形成的“记忆”之上的种种话语争夺、选择、阐释与译解,是谓“记忆话语”。

1.2 “大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

翻译与阐释,自施莱尔马赫始,再通过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哲学思进,其联

结关系不断得以明确与加强。当乔治·斯坦纳(2020：1，298)明确“理解即翻译”时,翻译在本质上也就成为一种阐释了。可以说,“经由翻译,过去被传递到未来。如同记忆一样,翻译总是不忠实的,因为绝对完美的记忆或绝对完美的翻译都不可能存在。翻译也同记忆一样,书写未来,而且是通过重释过去来完成这样的工作”(Bassnett，2003：293-309)。因此,随着记忆研究的文化介入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出现了记忆研究的翻译阐释或翻译研究的记忆路径,进而有了学术合流、理论共建(Brodzki，2007；Deane-Cox，2014；罗选民，2014；罗国祥，2017；陈美红，2017；闫亮亮，2018；付添爵，2020：174-216；李广寒，2020)。

但记忆与翻译不应只停留于研究路径互补的简单“连接”,更应建立基于阐释性话语的深层“联结”。一方面,如果说记忆是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这或多或少与翻译在话语阐释的层面上达到了某种耦合,因为意义建构离不开阐释的驱动(Schleiermacher，1992：141-166),而阐释哲学的出发点是作为历史与社会框架内的个体使自身适应环境、理解他人并开展社会性活动,与翻译尤为相关,二者天然共生(Stolze，2010：141-146)。另一方面,伯曼和利科进一步将“翻译愿望”(the desire to translate)视为一种“更顽强、更深刻、更隐蔽”(Ricoeur，2006：21)的底层观念与话语逻辑,使之成为阐释的动力和记忆的源泉。因此,罗选民(2024：3)首创“以文化记忆为引擎,以传播为目的,从共时与历时的角度对一种文化的经典翻译进行持续的、动态的、超越性的多模态互文阐释与形象建构”的“大翻译”观念,实际上体现的正是记忆与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

进而言之,“大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主要反映在记忆话语的建构与翻译话语的达成两个层面。记忆话语的建构包含了翻译阐释的因子,即翻译所生产的话语(张佩瑶，2004)成为记忆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翻译话语的达成可理解为记忆的再度阐释与竞逐,包含跨语际的记忆转换、同语内的记忆传递以及符际间的记忆重塑。

1.3 阐释性话语联结下的翻译现代性追求

“大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有助于洞悉翻译现代性追求。艾伦·斯温杰伍德(Swingewood，1998：140)指出:现代性是以指称话语的形式表现现代社会的“新”,它是关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发生变革的结构性概念,它确信科学的理性能够揭开非理性的假面并指明必要的社会变革之路。且不论标榜“科学理性”的现代性是否构成认知世界的最优选,作为话语的现代性至少在记忆的层面试图充当人类认识世界的结构性概念或范式,其变革的意旨就在于同“旧”的过去撇清,确立“新”记忆并建构“新”话语,而“新”记忆的确立实际上就是现代性对于“新”话语的追求,也是现代性得以实现的底层逻辑与路径保障。

可以说,现代性的成构主要表现为“新记忆话语”的确立。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性是一个超越地方性单语文化的跨语际概念,因此,试图充当认知世界的结构性概念或范式的现

代性则需要通过语内、语际、符际等途径确立普遍性、世界性的记忆话语联结,而这恰恰就是翻译现代性的记忆话语生成过程,也是“大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能够洞悉的对象。

具体而言,作为结构性概念或范式的现代性以追求真理为归趋,而认识范畴的真理往往以客观范畴的事实为依据。在翻译现代性中,原文本代表客观事实,是最高标尺。但主体对事实的确认(感官捕捉与意识加工)构成第一重解读,这种解读基于翻译阐释的记忆生成。翻译行为的落实意味着主体记忆的诞生,翻译与记忆实现阐释性话语联结。

如此一来,客观事实成为主体心中的“事实 I”。当“事实 I”被主体用自身所熟知的符号和言语从思维意识中表征(翻译阐释)出来时,就变成了主体叙述下的记忆话语,客观事实从“事实 I”变为“事实 II”。当主体之间就客观事实进行对话时,实际上是诸多“事实 II”的彼此说服,即话语权力的交锋与辩驳。此时,被奉为最高标尺的客观事实反而更多具有了仪式性,换言之,事实的功能性转变为了仪式性,让渡的功能体现为话语权力彰显。也就是说,致力于“新记忆话语”确立的翻译现代性以事实为材料,以话语为手段,通过阐释机制追求某一个或一类“事实 II”的最大共识或公度性,从而将这种源于个体记忆的“事实 II”塑造并建构为集体记忆的“事实 III”。这种“事实 III”已非事实本身的纯然代表,更多是一种观念的彰显,一种权力观念的诉求,一种话语权力观念的竞争,一种记忆话语的移植与记忆“基因”的繁衍。最后,客观事实的原初记忆渐渐模糊,留下的只是对公度性集体记忆的话语竞争与权力角逐。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通过翻译事业对二战后的日本形象进行了现代性的记忆话语改造。美国出版商选择一些日本作品予以译介,重塑日本文学的诗学与典律,并将其作为确定了的记忆进行深植与传播。于是,日本在以确立“新记忆话语”的翻译现代性的重塑下,成为了“一个颇具异域情调、唯美式的典型异邦,这与其在战前那种穷兵黩武、暴戾恣睢、怙恶不悛的威胁性形象相去甚远”(Fowler, 1992: 1)。

归结而言,“大翻译”视阈下的翻译现代性包含了记忆话语的确立与翻译话语的建构。因此,基于记忆与翻译深层耦合的“大翻译”,能够从阐释性话语联结的维度对翻译现代性作出洞悉与解读,即翻译现代性实际上是主体依据自身的记忆话语通过翻译行为不断对他者进行的记忆再造与形象重塑。

2　“企鹅经典”《庄子》译旅的翻译现代性反思

2.1《庄子》英译史中的“记忆-原型”

按照雅各布森的翻译分类范式,“典籍翻译通常要经过语内和语际两个过程”(黄国文,2012: 64),即从典籍文本到现代英语的跨语际传译至少包含了语内的翻译阐释与记忆

转递。某种程度上,现今的《庄子》包含如郭象等注疏者的记忆、理解与阐释,基于原本的语内、语际译本,译者、时代、环境等各种人文阐释与历史记忆。因此,基于“大翻译”的统观视野,对《庄子》英译的回溯理应包括对其进行的注、疏、释、译等各种语内文化记忆的传承爬梳,其过程蕴含了时空范畴的翻译阐释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记忆话语移植。不过,限于篇幅与要旨,这里仅对《庄子》英译及相关研究作概览性回溯。

自 1881 年巴尔福(Balfour)选译本诞生,《庄子》跨语际记忆译迁已近一个半世纪。诸多译本[①]中有选译(Watson, 1964、1968、2013; Graham, 1981; Ziporyn, 2009 等)、全译(Legge, 1891; Ware, 1963; Mair, 1994; 汪榕培, 1999 等),以及各种译写、译创、评注等(Merton, 1965; Stephen, 2009)翻译方式;翻译目的有趋向普通大众(Palmer, 1996),也有面向专业学者(Fung Yu-lan, 1931);翻译传播良好者几经再版与修订(Feng et al., 1972、1974)。

对《庄子》英译的回溯除了散点式译本罗列,还应注意贯穿诸多译本或整个英译史的思想原型。从“大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出发,思想原型之一便是围绕翻译阐释的记忆话语转移与传递,即《庄子》英译史中存在变动不居的“记忆-原型”。这种原型式记忆译迁在语言层面的言说被叙述为“记忆话语”。如冯友兰(Fung, 2012: 1)曾在译序中肯定“翻译即阐释,翻译即评论”,并直言“对理雅各和翟理思的译文进行了参考及灵活借用。然而,也有一些重要的术语、短语或段落,它们是整个章节的关键,对它们的不同解读可能会赋予整个章节不同的调子或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我通常会根据我所认为的庄子哲学的正确阐释来给予新的阐释,并会同注解与评论形成属于我自己的翻译”。序言无疑流露出译本包含对前人翻译记忆的传承以及基于自身记忆的翻译阐释,尤其是后者,点明对前人记忆话语,如“重要术语、短语或段落”的反拨与重塑。贯穿于《庄子》诸多英译的“记忆—原型”在“企鹅经典”译本中饶富意趣,因为记忆在这个文本译旅中产生复杂性文本回转、思想对话与翻译现代性反思。

2.2 “企鹅经典”译本之译旅评思

1996 年,企鹅书屋出版了由帕尔默(Palmer)领衔翻译的《庄子》全译本(B)*The Book of Chuang Tzu*(2006 年再版、2007 年重印),2010 年又出版了以该全译本(B)为底本的选译本(B′)*The Tao of Nature*。2013 年该选译本以《道法自然》(A′)之名重返现代汉语,实现了一次文本译旅(图 1)。

① 本文不将“仅罗列未引用”的译本列入参考文献,读者如有所需,可与笔者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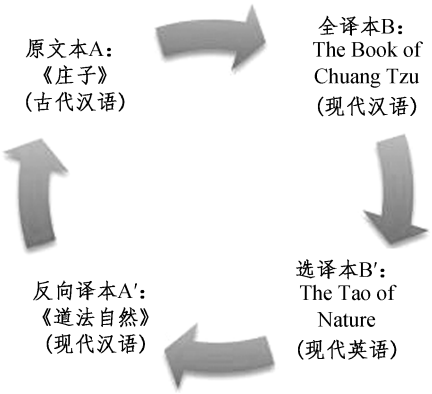

图 1　《庄子》文本译旅

详析之，全译本 B 旨在面向大众读者，为便于阅读，译者采用了简化的中文姓名罗马化形式，并省译了原文中需要依赖双关语才能明确意义的一些隐晦名称。在前七章中，译者还用特殊图符对文本进行切分标记，以表明它不是按逻辑顺序展开的，因为译者认为这几章主要是独立的故事和讨论，按逻辑顺序去阅读反而是一种错误。尤为特别的是，该译本每章初始还有“大翻译”式的图文增译，其中既有山水抒情画，也有佛道信仰图。一方面，这源于译者的叙事记忆，正所谓“插图与文本的结合最终影响了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在逻辑思维混乱时，这种结合确保了兴趣不失……除却偶尔的文字关联，文本和图像往往是两个平行的表意系统”（Feng et al.，2014：11，249）。另一方面，图文增译反映译者对《庄子》主体精神的记忆重写与重释，即“《庄子》之‘无我’，在彭译本那里变成了对主体意识的强调，显示出译者高扬的主体性，是另外一个《庄子》”（于雪棠，2015：B05）。除此之外，该译本为多人合译，且参照了冯友兰、华兹生、理雅各等译文，实乃集体记忆的结晶。

选译本 B′入选了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丛书，因其体积小，便于携带，有更好的文化传播效果。该译本略去了全译本中的注释与插图，根据译者的理解重新建构叙事框架，摘取部分观念进行哲学思想的传导。《道法自然》（A′）的译者（2014：III）指出：“对西方译本的回译，特别是古代文本，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参照西方学界所进行的解读，毕竟我们对古文的解读也并非总是意见一致。有些译本更是对原文本进行了重新编排，这也有助于我们寻找古代文本内部的系统结构。”因此，选译本 B′的“组织安排使得《庄子》有了一个系统的脉络，为理解庄子的思想贡献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架构”（庄子，2014：III）。

纵观文本译旅，A—B 与 B′—A′是典型的语际翻译传播。A—B 中的二者是“原本—译本”关系。B—B′中的 B′既是基于全译本 B 的语内改编与选/摘译，是叙事的重新建构与思想记忆的全新表达；也是呼应原文本 A 的一次语际翻译改写。从“大翻译”视角来看，B—B′也可谓“原本—译本”关系。在 A—B—B′—A′—… 这一链条中，A′表面上与 A 同语近言，但 A′直接脱胎于 B′，不仅体现在文本的结构与叙事上，更反映在思想的内涵与态度中。B′不再附庸于 A 或 B 的译本，从其选译的形式与叙事而言，它已是具有自觉品格、表达自

我记忆的独立文本。因此,本文并未将 B′—A′视为 A—B 的“回译”(back translation),而是将其称为“反向翻译”(reverse translation)。因为从思想表达性层面来说,“反向翻译”比“回译”更能反映 B′—A′翻译的事实及对文本的尊重,原因在于后者生成的前提是原文本的权威性,即谈及“回归”必然存在“原初”这一前提预设,回译就是判断译文本是否能够回归母体,以原文本为中心。而反向翻译则将每一个文本视为独立品格的“新”存在,毕竟生产出来的译文本在落地之时就具有自我记忆、文本价值与现代性思想影响。总之,将《庄子》(A)全译后生成 *The Book of Chuang Tzu*(B),对全译本选译后形成 *The Tao of Nature*(B′),再将选译本反向翻译为《道法自然》(A′),是《庄子》异语形象的一次跨语际“大翻译”回归,而这次回归具有十足的现代性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反向译本 A′与原文本 A 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翻译关联,即前者虽然不是基于后者的语内翻译产物,但在经历一系列时空旅行后产生的文本价值使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渊源与对话,即原文本是反向译本的母题与溯源,而反向译本也成为原文本在新语境中的来世生命(afterlife),这是否也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无名有实”的语内翻译景观?不过,这种来世生命通过记忆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并非全然脱胎于原文本,更是具有现代性的异语文化之理解,即潜藏其中的是思想的对话,是记忆话语与翻译阐释耦合下的现代性追求。概而言之,译旅之后的文本附着了翻译的现代性色彩,充满了“现代”之于“传统”的揣度。

2.3 译旅中的翻译现代性反思

上述译旅评思揭示了各个文本在翻译中都存在形式维度的结构塑形。结构形式的排布具有特定的现代性意义,或者说,现代性的意义展现离不开结构形式的衬托与架构。因此,从“大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检视译本中的结构重置,或可洞悉“企鹅经典”《庄子》译旅中的翻译现代性。

《庄子》的精神价值与思想遗产并不仅仅散见于独立的故事与分立的论述,其作为一个整体性文本蕴含了更深层的记忆话语,呈现的形象是贯穿式的智慧与理念。纵览全译本(B)、选译本(B′)和反向译本(A′),虽然在微观的章节层面少有增、删、改等变译行为,尽量保持了篇章的全译,但恰恰是宏观的体例重置反映出看似忠实的翻译行为背后潜在着迥异于“中国传统”的“西方现代性”形构与记忆。具体而言,各译本在生产过程中或多或少进行了体例重置与结构改编,这看似简单的变译行为从宏观上打破了原体例链条。新型的文本组合重构了不同于《庄子》整体的语篇形象,反映译者对于原文本的认知理解发生变化,包括情感态度、思想立场、价值偏好等因素,表达了译者自身的记忆话语。换言之,译者的主体性记忆开始深植于译本,读者所接受的是译者重置的记忆与形象。而引导这种主体性观念的驱力就在于现代性翻译话语的规导与塑形,即译者站在自身的视角,以西方现代性为据,缺乏对异质性的尊重,通过翻译话语重塑原文本所建构的记忆与形象。某种程度

上,诸译本可谓借译《庄子》之名,行叙事建构之实,即将《庄子》的文本材料纳入自创的叙事框架,塑造相异的叙事形象,刻画不同的历史记忆,彰显自身的记忆话语。

因此,在《庄子》译旅中,原文本名义上的事实权威实际上经历了上述话语耦合下的记忆竞逐与翻译阐释,不断地被予以西方现代性解读。于是,翻译现代性的追求勾连了过去与现在,连接了跨时空对话。那么,在《庄子》译旅中,传统的精神意蕴与记忆话语是否就得到了全然传承与复制呢?还是说,译旅的“回归”已然成为了《庄子》名义下的他者之物?欲解答此疑,需要对翻译现代性作出深层洞悉。

且不论现代性的肇始渊源之复杂,以现时之忖度,现代性仍然在继续,依旧是“未竟之事业”。“翻译与中国现代性”经由“西学东渐”这一翻译式知识生产与转移后逐渐内化于中国实践而形成的思想一直产生影响并绵延至今。可以说,生发期内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性”的互动是显性的知识生产阶段,而超越生发期后,这种显性的知识生产已然进入隐形的知识固化乃至思想沉淀,而隐形的思想内化比显性的知识生产更不易为人所察,后人难免将其视为自己原本的记忆脉络,发生记忆的错乱,进而衍生出异样的形象认知。这说明,知识与概念的阐释范畴经由翻译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记忆中,塑造了现代诸多习以为常的信仰与认识,即树立了对名义上“传统”的实际性现代认知与形象体认。中国“传统”成为一种被西方现代性越俎代庖的虚妄形象,在这种虚妄形象的塑造中,记忆与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充当了工具,并从知识与概念的生产与转移入手,形成了“现代性翻译话语”这种跨语际现象。具体而言,翻译现代性生成的现代性翻译话语已经影响我们对“传统”的记忆与形象认知,“传统”形象成为翻译现代性所主导的再造物。在 20 世纪下半叶逐步增势的“东学西传”中,翻译话语的底色更多还是西方现代性话语,至少包含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理所当然”的话语统摄以及内化于本土思想“日用不知”的话语比附。前者主要是西方译者(包括汉学家)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学术话语背景以及逻辑系统下(超越性思维)翻译中国,从而形成了西方对中国形象或者记忆建构的历史和传统。后者当然就是误把他者话语作为自身记忆脉络(关联性思维)的中国译者,他们的翻译输出往往还是西方建构的中国形象的衍生物。因此,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在参照西方模式并使用其现代性话语静止地、机械地进行翻译建构。

《庄子》文本译旅是一个翻译现代性的追求轨迹,“大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可以解读各个文本间的对话关系。然而,文本链条所承接的这种对话更多是“现代”对于“传统”的揣度。拉康认为,对话这种东西并不存在,对话是欺骗(卢迪内斯库,2020:374)。因为对话表面所体现的平等言说与潜在的话语竞争与记忆僭越是矛盾的。对话可以实现客观信息的交换或者达成某种共识,但个体之间没有真正的记忆交流,一切对话都是个人独白的叠加,是话语权力博弈中相互之间的记忆建构与形象塑造。回到“旅行”的原型本质,

“回归”往往是携带了新的记忆与精神,从而与“出发”形成对照,联合构成一个有着意义格差的往返轨迹。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谁的“现代性”,无论何种结构性概念或范式,都是在通过重建“新记忆话语”来表达自身的存在意义。

3 结语

寄身于主体的记忆并非依照个人到集体再到文化社群的线性存在,更多是辗转于不同主体间的“多重归属”。记忆的这种流转形态促发了不同主体间阐释的形成,即“记”与“忆”在“主体”译介与间性阐释下产生的错位与张力编织了“记忆话语”之网。同时,翻译即阐释的理念也催生了“翻译话语”的存在形态。因此,记忆话语与翻译话语通过阐释性联结塑造了“大翻译”理念。这一理念综合了记忆的翻译话语本质与翻译的记忆话语形态,前者为记忆的存在方式提供了翻译的或然视角,后者给予翻译现象一个记忆式解读路径。换言之,“大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明确了记忆话语的生成包含了翻译阐释的因子,而翻译话语是不同记忆在语际、语内与符际间的重释、再塑与转换。

“大翻译”的阐释性话语联结为“企鹅经典”《庄子》译旅的翻译现代性提供了一种解读视角。统观下的“译旅”表现为“出发-回归”的翻译过程,其包含面向异质现代性的前进之旅,也包含回归自我传统的记忆之途。留存于往返间的记忆与翻译话语厘定了当下存在的意义,即追求作为认知世界的结构性概念或范式的现代性。总之,《庄子》文本译旅的明线推进是不同记忆话语的对话与争夺,而暗线驱动则是“现代”对于“传统”的揣度,即潜藏其中的思想对话是记忆话语与翻译话语耦合下的现代性追求。

参考文献:

Bassnett, S. 2003. Translation As Re-membering[G]//E. Caldicott & A. Fuchs. *Cultural Memory: Essays on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xford: Peter Lang, 293-309.

Brodzki, B. 2007. *Can These Bones Live? Translation, Survival and Cultural Memory*[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eane-Cox, S. 2014. Remembering Oradour-sur-Glane: Collective Memory in Translation [J].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2): 272-283.

Feng, G. F. & J. English. 2014. *Chuang Tzu: the Inner Chapter* (*4th edition*) [M]. California: Hay House Inc.

Fowler, E. 1992. Rendering Words, Traversing Cultures: On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ng Modern Japanese Fiction[J].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44.

Fung Yu-lan. 2012. *Chuang-tzu*[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Halbwachs, M. 1980. *The Collective Memory*[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Hoffman, E. 2004. *After Such Knowledge: Memory, History, and the Legacy of the Holocaust*[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Ricoeur, P. 2002. Zwischen Gedächtnis und Geschichte[J]. *Transit*: 3-17.

Ricoeur, P. 2006. *On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chleiermacher, F. 1992.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G]//A.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41-166.
Stolze, R. 2010. Hermeneutics and Translation [G]//Y. Gambier & L. V. Doorslaer.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 1).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41-146.
Swingewood, A. 1998.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M].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柏拉图. 2007. 理想国[M]. 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陈美红. 2017. 忆与译的轮回: 中国当代女性书写与英语(文化)翻译现象[J].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1): 73-83.
付添爵. 2020. 作为思维方式的“大翻译”研究[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黄国文. 2012. 典籍翻译: 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以《论语》英译为例[J]. 中国外语(6): 64-71.
李广寒. 2020. 文化记忆视阈中翻译的再生产功能探析[J]. 江西社会科学(9): 248-253.
利科. 2019. 记忆与历史之间[J]. 文化研究(3): 7-16.
罗国祥. 2017. 文化记忆与翻译刍议[J].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1): 64-72.
罗选民. 2014. 文化记忆与翻译研究[J]. 中国外语(3): 扉页, 41-44.
罗选民. 2024. 大翻译与文化记忆:融合与启示[J]. 外国语文(1): 1-8.
诺拉. 2015.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乔治·斯坦纳. 2020. 巴别塔之后:语言及翻译面面观[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闫亮亮. 2018. 严复选译《群己权界论》的文化记忆[J]. 中国翻译(5): 80-86.
扬·阿斯曼. 2015.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 2020. 拉康传[M]. 王晨阳,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于雪棠. 2015. 简说企鹅书屋《庄子》英译本的插图[N]. 中国社会科学报, 06-24 (B05).
张佩瑶. 2004. 对中国译学理论建设的几点建议[J]. 中国翻译(5): 5-11.
庄子. 2014. 道法自然: 英汉对照[M]. 北京: 中译出版社.

Reflections on Translated Moder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Journey of the Penguin Classic *Zhuangzi*

FU Tianjue

Abstract: Big Translation embodies the deep-seated discursive coupling between memory and translation, which can provide an insight into the translated moder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ive discourse connection. The interpretive discourse connection of *Big Translation* clarifies that the generation of memory discourse includes factors of translation or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discourse is the reinterpretation, reshap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fferent memories in interlingual, intralingual and intersemiotic contexts. Based on thi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ext structure reset in the translation journey of *Zhuangzi* in the *Penguin Classics* series reveals that the translated modernity under the vision of *Big Translation* is actually the subjects' continuous memory reconstruction and image remolding of others through translation behavior by means of their own memory discourse.

Key words: big translation; memory discourse; translated modernity; *Zhuangzi*

责任编校:龙丹